

农民工性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与群体差异

——基于公众情境理论视角

李莹¹, 林功成^{2*}, 陈霓³

(1.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2.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3.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澳门 519000)

摘要: 基于 186 份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民工问卷数据和公众情境理论视角, 实证检验心理因素对农民工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对性病防治问题的涉入度认识以及采取性病防治行动的障碍感是影响农民工进行信息寻求的主要因素。依据感知涉入度和障碍认识水平, 将农民工分为性健康信息搜寻的主动人群、普通人群和被动人群, 分别占样本人数的 29.9%、40.1%、29.9%。三类人群通过各类媒体渠道接触性健康信息的频率均存在显著差异。主动群体通过各类渠道接触性病预防相关信息的频率最高; 普通群体接触互联网信息和大众媒体信息的频率显著低于主动群体, 但在其他渠道的信息接触方面与主动群体没有差别; 被动群体在各个渠道的信息接触频率上均显著低于主动群体, 在互联网信息接触和人际讨论的频率方面显著低于普通群体。

关键词: 农民工; 性健康; 信息寻求; 信息接触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6)01-0054-07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egm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xual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Based on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LI Ying¹, LIN Gongcheng^{2*}, CHEN Ni³

(1.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Macau University, Macau, 519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impacted migrant workers' exposure to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related information. A survey among 186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s was conducted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included involvement recognition and constraint recogni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This study further divided migrant workers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ir involvement recognition level and constraint recognition level, namely, active group, neither active nor passive group, and passive group. The three groups occupied 29.9%, 40.1%, and 29.9% of the sample, respectively. We found that, the active group receives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medias most frequently; neither active nor passive group was exposed to information from internet and mass media less frequently than active group,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garding other medias; passive group receives information less frequently than active group from all the medias, and less frequently in internet 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face-to-face discussion than neither active nor passive group.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sexual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information exposure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政府统计数据, 中国农民工数量在 2014 年已达到 2.9 亿。为了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机会, 农民工需要经常在城市间流动。较低的经济地位、

收稿日期: 2015 - 12 - 11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资助项目(14QNFC1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GD15YXW01)

作者简介: 李莹(1985—), 女, 黑龙江大庆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传播。*为通信作者。

较高的心理生理压力以及医疗知识的缺乏使农民工暴露在多种健康风险之中,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缺失以及他们面临的巨大健康风险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威胁。

在农民工所面临的众多健康风险中,性健康逐渐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对多地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非婚性行为较普遍,且无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比例较高^[1]。从医院的男性科门诊接诊病例来看,农民工的性病发病率高居各职业的首位^[2]。农民工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且文化程度较低,性病预防知识欠缺,自我保护意识差^[3]。农民工更有可能实施造成 HIV 感染或性病感染的行为,从而将自身置于性病和 HIV 感染的较高风险当中^[4],导致成为性传播疾病的受害者。为此,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性病预防工作,在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学校、建筑工地等农民工集中的工作场所进行各类防治活动,为农民工提供性病防治图片展、义诊、咨询、防艾宣传手册、安全套等物品。

虽然政府在农民工性疾病预防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并不充分,并且较少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而且,绝大多数以农民工性健康为主题的学术研究采取的都是外部视角,即强调政府宣传在提高农民工性健康知识和预防性疾病能力上的作用,缺乏对农民工主观能动性的探讨,有关农民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主动搜索性健康有关信息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笔者拟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农民工群体为调查对象,基于公众情境理论,考察农民工的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据此将农民工细分为不同的性健康信息传播群体,探寻不同群体通过各类媒体渠道接触性健康信息的频率差异,从而为提升农民工的信息接触效率提供策略支持,为农民工群体的性病防控提供路径参照。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1. 变量选取

对人们的信息寻求行为的分析可借助多个理论予以说明,本研究应用格鲁尼格(J. E. Grunig)的公众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5]作为框架来探讨农民工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

该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以解释信息行为并细分公众,如 Atwood 和 Major、Lee 和 Rodriguez 运用公众情境理论,准确解释人们在特定议题上的信息传播行为^[6-7],因此,基于该理论而产生的群体细分也被认为能够指导信息传播的实践活动。

公众情境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因变量是信息寻求行为与信息加工行为。前者是主动的传播行为,可被定义为“有计划地在周围环境中搜寻有关某一特定主题的消息的行为”^[8]。后者则属于被动的传播行为,其定义是“未经计划而遇到信息,并伴随着后续的信息处理”^[9]。主动和被动的行为主体均有可能在遇到信息后进行较强程度的信息加工,但仅有主动的行为主体会进行信息寻求行为,因此,信息寻求行为是辨识主动的信息行为主体的主要变量。由于性健康信息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并非不可缺少的日常关键信息,且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针对农民工进行性健康教育与性健康信息传播困难重重,在实践当中,那些愿意主动寻求相关信息的个体最有可能积极配合健康教育,甚至成为健康信息的二次传播者。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的信息主动寻求行为。

公众情境理论使用“问题认识”、“行动障碍认识”和“涉入度认识”三个自变量来预测信息传播行为。一般认为,人们的问题认识越强、认识到的行动障碍越少、涉入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主动的信息寻求行为。

问题认识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一个事件构成了问题。当人们“发现有必要针对某种现状做点事情,并且停下来思考该做些什么”时^[8],便形成了问题认识。当人们在面临问题困境时,往往手头没有可以立刻使用的解决方案,而这种被感知到的实际情况促使人们在行动前考虑该做些什么^[10]。在本研究中,该变量指的是农民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性病防治构成了问题。当意识到性病防治已构成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个体会考虑该做些什么、怎么做,进而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性健康信息的主动寻求可被视为寻求者试图解决性病防治问题的一种行为表现,因此,性病防治问题认识与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有正向关联。

涉入度认识被定义为人们所感知的自身与所面临问题之间的联系^[11],一个人越觉得自己与所要

解决的问题之间存在关联,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10]。研究者也指出,高涉入度的个体倾向于更多获取与解决该问题有关的知识,并且更加频繁地进行问题分析^[12]。性病感染的实际发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会对相关个人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感知到自身与性病感染的关联性,会促使农民工个体更广泛地寻求信息来了解治疗性病或降低感染风险的途径,因此,涉入度认识与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之间有正向关联。

行动障碍认识被定义为人们所意识到的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行为所遇到的阻碍程度,所意识到的行为障碍越多,越有可能降低人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13],一旦人们认为自己无法解决问题或改变当前的局面,便也不太可能进行与该问题有关的信息寻求和加工行为^[14]。感染性病通常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而农民工由于感受到工作规律、健康素养、经济实力、他人眼光等多方面所带来的压力,未必有机会通过借助正规的医疗手段来积极、彻底地进行应对,也因而可能产生无力解决问题的感受,与之相关的种种解决问题的努力也有可能被放弃,因此,行动障碍认识与信息寻求行为有负向的关系。

2. 研究假设

总体上看,根据公众情境理论的主要假设,当人们产生了问题认识、并认为自己面临较少的行动障碍、同时又感知到较强的问题涉入度时,就更有可能进行积极的信息寻求行为^[15]。与之对应,当农民工产生了性病防治问题认识、并认为自己面临较少的性病防治行动障碍、同时又感知到较强的性病问题涉入度时,就更有可能更加主动地寻求性健康信息。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农民工的性病防治问题认识对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主动程度有正向影响;越认为性病防治已构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个体,越有可能主动寻求性健康信息;

假设 2: 农民工的性病防治问题涉入度认识对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主动程度有正向影响;越认为性病防治问题与自身有关联的个体,越有可能主动寻求性健康信息;

假设 3: 农民工对于解决性病防治问题的行动障碍认识对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主动程度有负向影响;行动障碍感越强烈的个体,越不可能主动

寻求性健康信息;

假设 4: 信息寻求主动程度越高的农民工,通过各类渠道(互联网、大众媒体、政府材料、非政府组织材料、与他人的讨论)接触性健康信息的频率越高。

在依据公众情境理论进行上述假设之后,本研究还将人口统计因素纳入了控制变量,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5: 男性、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月收入越高以及与配偶或男/女朋友居住在一起,越倾向主动寻求性健康信息。

在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依据问题认识、涉入度认知、行动障碍认知的差异,是否可将农民工划分成不同的性健康信息传播细分群体?不同细分群体的媒体信息接触是否存在差异?性健康信息寻求的主动性是否存在差异?实施性病预防行为的意向是否存在差异?

三、样本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 年的数据,农民工有 59.3% 的年龄在 40 岁以下,平均月收入为 2 290 元,22.6% 分布在长三角地区,19.8% 分布在珠三角地区。本次调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由访问员采取偶遇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86 份,其中 66 份来自上海,87 份来自广州,33 份来自珠三角其他地区如珠海和中山。

(1) 自变量包括性病防治问题认识、涉入度认识和行动障碍认识。对三个变量的测量依据以往文献所使用的量表而确定。对于每一个变量,被试在各条目上的得分被求取平均值以得出该变量的分值。

在性病防治问题认识方面,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下述问题作出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在性病的防治方面还有诸多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在性病的防治方面,其目前的状况与您所期待的状况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在性病的防治方面,您有多强烈地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改善其目前的状况?在性病的防治方面,其现状与您所期待的状况之间的落差有多大。该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是 0.796。

在涉入度认识方面,被试需要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题项:您认为自己和性病防治这个问题的关联程度有多高?在多大程度上,您相信性病防

治这个问题与您或和您亲近的人有关联？在多大程度上，您相信性病防治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您个人？该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652。

在行动障碍认识方面，被试需要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题项：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您可以为性病的预防与治疗做点事情？作为个人，您认为您在性病防治方面的努力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来改变其现状吗？只要您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您相信您的努力会对解决性病防治这个问题产生影响？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13。三道题均被反向编码，其均值作为行动障碍认识得分，分数越高，表示行动障碍认识程度越高。

(2) 信息寻求的主动性，该变量由两道问题测量。第一题要求样本人群在 5 点量表上(1=非常不主动, 5=非常主动)指出查找与性病防治有关信息的主动性。第二题要求调查对象在 5 点量表上(1=非常少, 5=非常多)指出使用在查找性病防治相关信息上的时间。样本人群在两道题上的得分均值代表了信息寻求的主动性(Cronbach's Alpha = 0.811)。

(3) 各类渠道信息接触，研究向样本人群询问了一系列不同渠道(互联网、大众媒体、政府发放的材料、非政府组织发放的材料、与其他人的讨论)信息接触的频率，样本人群需要在 5 点量表上指出通过每一类渠道接触性健康信息的频率(1=非常少, 5=非常多)。

(4) 实施性病预防行为的意向，问卷向样本人群询问了实施 14 类性病预防行为的可能性，例如“避免婚外性行为”、“恰当、正确地使用避孕套”、“性生活活跃人士应定期检查”等。被试需要在 5 点量表上指出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1=非常不可能,

5=非常可能)。样本人群在 14 道题上的得分被求取均值来代表实施性病预防行为的意向(Cronbach's Alpha =0.877)。

(5) 人口统计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以及与配偶或男/女朋友的居住状况。性别变量设定为二分变量(0=男性, 1=女性)，与配偶或男/女朋友的居住状况也是二分变量(0=未居住在一起, 1=居住在一起)。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均由 5 点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表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

描述性统计揭示了如下样本特征：66.1%为男性(121 人)，32.8%为女性(60 人)；大多数(64.5%)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在 20~39 岁，40~49 岁之间的样本占 15.8%(29 人)，50 岁及以上占 10.4%(19 人)，19 岁及以下占 9.3%(17 人)；66.7%的样本人群教育程度为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共 122 人)，23.5%在大专及以上学历(43 人)，小学及以下程度占 9.8%(18 人)；64.5%的样本人群月收入在 2 001~4 000 元(118 人)，21.3%低于 2 000 元(39 人)，13.7%高于 4 001 元(25 人)；54.6%的样本人群与配偶或男/女朋友居住在一起(100 人)，45.4%处于独居状态(83 人)。

样本人群对性病问题认识程度较高(均值=3.40，标准差=0.750)，但对性病问题的涉入度认识较低(均值=2.85，标准差=0.744)，此外，样本人群所感受到的行动障碍略高于中等水平(均值=3.33，标准差=0.810)。样本人群的信息寻求主动性较低(均值=2.36，标准差=0.777)，但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实施性病预防行为的意向(均值=3.55，标准差=0.623)。主要变量的偏度和峰度的绝对值均小于 0.8，因此被认为符合正态分布(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有效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性病防治问题认识	178	1.00	5.00	3.40	0.750
涉入度认识	180	1.00	4.67	2.85	0.744
行动障碍认识	180	1.33	5.00	3.33	0.810
性病预防信息寻求的主动性	181	1.00	5.00	2.36	0.777
上网浏览信息的频率	175	1.00	5.00	2.36	0.879
接触大众媒体信息的频率	182	1.00	5.00	2.62	0.838
接触政府材料的频率	182	1.00	5.00	2.51	0.878
接触非政府组织材料的频率	178	1.00	4.00	2.40	0.873
与其他人讨论的频率	179	1.00	5.00	2.27	0.825
实施性病预防行为的意向	183	2.00	5.00	3.55	0.623

*. 由于问卷中存在缺失值，所以，各变量的有效样本量不尽相同。

四、信息寻求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性病防治问题认识、涉入度认识以及行动障碍认识对信息寻求行为的影响。回归分析模型将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以及与配偶或男/女朋友的同居状况纳入分析模型作为控制变量,表2展示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解释了“信息寻求行为”这一因变量变差中16.3%的部分。在0.05水平上,五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与配偶或男/女朋友共同居住的状况)均未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假设5被拒绝;三个主要自变量当中,问题认识未产生显著结果,涉入度认识和行动障碍认识的影响显著。

表2 农民工性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心理影响因素的多元OLS回归分析结果

	B	标准误	β	Sig.
常量	2.635	0.571		<0.001
女性(参考变量=男性)	-0.221	0.125	-0.135	0.079
年龄	-0.032	0.056	-0.046	0.565
教育程度	-0.003	0.073	-0.004	0.965
月收入	-0.089	0.071	-0.111	0.214
与配偶或男/女朋友居住在一起(参考变量=未居住在一起)	0.144	0.126	0.093	0.255
性病防治问题认识	-0.088	0.081	-0.084	0.279
涉入度认识	0.324	0.087	0.303	<0.001
行动障碍认识	-0.180	0.074	-0.186	0.017
R^2			0.163	
Adjusted R^2			0.121	
F			3.887***	

*** $p < 0.001$

(1) 涉入度认识的影响显著,与假设的方向一致。这说明农民工越认为性病防治与自己相关,越可能会主动搜索相关信息。

(2) 行动障碍认识的影响显著,与假设的方向一致。换言之,感觉到解决性病问题而面临的障碍程度越高,农民工越不可能去主动搜索相关信息。

(3) 问题认识与信息寻求行为并无显著关系,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原理论当中将“问题认识”产生的前提确定为“当人们发现有必要针对某种现状做点事情,并且停下来思考该做什么时,便形成了问题认识”,而在此定义指引下所使

用的量表,将性病防治问题视为一种“社会性”的问题,但实际上该问题只有在带来个人风险感知时,才会更有力地影响到预防行为的采纳。

(4) 信息寻求的主动性与各类媒介信息接触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研究使用偏相关分析检验信息寻求的主动性与各类媒介信息接触行为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与配偶或男/女朋友居住状况的影响之后,信息寻求的主动性与各类媒介信息接触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p 值均小于0.001),信息寻求越主动的个体,通过各类媒介渠道接触性病防治信息的频率越高(表3),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

表3 对信息寻求主动性与各类媒体信息接触频率的偏相关分析结果

控制变量	通过各类媒介渠道接触信息的频率	信息寻求主动性
性别、年龄、上网查询信息的频率	partial r	0.530
教育程度、月收入、与配偶或男/女朋友居住的状况	sig.	<0.001
接触大众媒体信息的频率	partial r	0.204
接触政府发放材料信息的频率	sig.	0.009
接触非政府组织发放材料信息的频率	partial r	0.287
与其他人讨论性病话题的频率	sig.	<0.001
	partial r	0.315
	sig.	<0.001
	partial r	0.423
	sig.	<0.001

五、农民工不同群体信息接触频率差异

在假设检验的基础上,研究使用涉入度认识和行动障碍认识这两个对信息寻求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作为依据,对农民工进行了群体细分。研究者以中位数为划分界线,在每一个变量维度上将样本划分为两类人群。最后,两个维度共可构成四组细分群体,即“低涉入度—低障碍感”组(38人,21.5%)、“低涉入度—高障碍感”(53人,29.9%)、“高涉入度—低障碍感”(53人,29.9%)、“高涉入度—高障碍感”(33人,18.6%)这四类人群。

在划分出上述四类人群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追问:四类群体之间的信息寻求主动性与实施健康行为的意向是否有所不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采取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检验。方差结果显示:在信息寻求主动性方面,四组之间的差异达统

计显著水准, $F=9.498, p<0.001$ 。进一步的事后检验 (Tukey test) 发现, 差异存在于“高涉入度—低障碍感”组与其他三组之间 (p 值均小于 0.01), 前者的信息寻求主动性 (均值=2.80, 标准差=0.688) 显著高于其他三组人群 (“低涉入度—低障碍感”组: 均值=2.08, 标准差=0.758; “低涉入度—高障碍感”组: 均值=2.18, 标准差=0.797; “高涉入度—高障碍感”组: 均值=2.24, 标准差=0.639), 而其他三组人群在该项上无显著差异 (p 值均大于 0.5); 在采取性病预防行为意向方面, 四组之间的差异亦达统计显著水准, $F=4.448, p=0.005$ 。事后检验 (Tukey test) 发现, “高涉入度—低障碍感”组 (均值=3.75, 标准差=0.610) 与“低涉入度—高障碍感”组 (均值=3.33, 标准差=0.549)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02$), 而其余两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其余组别与“高涉入度—低障碍感”和“低涉入度—高障碍感”两组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p 值均大于 0.1)。

对四组细分人群的比较分析揭示了组间的显著差异, 其中, “高涉入度—低障碍感”和“低涉入度—高障碍感”人群与其他组别的差异最为明显。因此, 为提升群体细分的简洁性及实践应用意义, 研究将“低涉入度—低障碍感”和“高涉入度—高障碍感”这两类人群合并, 并依据信息寻求和性病预防行为采纳的主动性重新命名三类人群。具

体而言, 将“高涉入度—低障碍感”人群命名为“主动人群”, 他们认为性病防治问题与自己有关联, 同时在解决性病行动时的障碍感较低, 这类人群占样本人数的 29.9%。“低涉入度—高障碍感”人群命名为“被动人群”, 占 29.9%。其余两类人群合并为“普通群体”, 占 40.1%。

研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了三类细分群体的各类媒介信息接触频率。表 4 显示, 三类人群接触各类媒体渠道信息的频率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 在互联网信息接触频率方面, 三类细分群体之间两两存在显著差异 (p 值均小于 0.05), 主动群体接触互联网的频率显著高于普通群体, 普通群体接触互联网的频率显著高于被动群体。在大众媒体接触方面, 主动群体的接触频率显著高于另外两组 (p 值均小于 0.05), 而普通群体和被动群体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在政府信息方面, 主动群体的接触频率显著高于被动群体 ($p<0.001$), 但普通群体与另外两类群体之间无显著差异。在非政府组织信息方面, 主动群体接触非政府组织发放的材料信息的频率显著高于被动群体 ($p=0.009$), 但普通群体与其他两个群体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人际讨论方面, 主动群体与普通群体的信息接触频率显著高于被动群体 (p 值均小于 0.05), 但主动群体和普通群体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表 4 三类细分人群通过各类渠道接触性健康信息频率的比较

信息渠道	被动群体		普通群体		主动群体		F	sig.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互联网	1.96	0.876	2.37	0.866	2.74	0.706	11.145	<0.001
大众媒体	2.34	0.876	2.55	0.824	2.94	0.669	7.739	0.001
政府发放的材料信息	2.19	0.878	2.46	0.892	2.83	0.760	7.433	0.001
非政府组织发放的材料信息	2.17	0.901	2.35	0.864	2.68	0.794	4.609	0.011
与其他人的讨论	1.92	0.813	2.33	0.793	2.53	0.784	7.825	0.011

总体而言, 主动群体在通过各类渠道接触性病预防相关信息的频率在三类人群中均位于最高水平; 普通群体接触互联网信息和大众媒体信息的频率显著低于主动群体, 但在其他渠道的信息接触方面与主动群体没有差别; 被动群体在各个渠道的信息接触频率上均显著低于主动群体, 在互联网信息接触和人际讨论的频率方面显著低于普通群体。

六、研究结论及其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 对性病问题的涉入度认识

以及行动障碍认识是影响农民工性健康信息寻求的直接心理因素。越认为性病预防问题与自己有关系的农民工越有可能主动寻求性病预防信息。因此, 性健康教育者及宣传者有必要提升农民工对性病感染的风险意识, 只有在农民工认为自身与性病产生关联时, 才有可能关注性健康方面的信息。此外, 如果感受到实施性病预防行为将遇到较多障碍, 农民工进行信息寻求的积极性会减弱, 性健康教育者有必要加强性健康行为教育, 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技能, 这将有助于农民工形成主动寻求信息来

维护自身健康的意向。

依据信息传播主动性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主动群体(高涉入度—低行动障碍感群体)、被动群体(低涉入度—高行动障碍感群体)和普通群体(低涉入度—低障碍感、高涉入度—高障碍感)。前两个群体在农民工样本中各自约占30%，普通群体约占40%。不过，虽然主动群体的信息寻求主动性较高，但总体而言，其得分仍略低于中等水平。在采取性病预防行为意向方面，三个群体的得分都较高。这显示了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性在中国属于敏感议题，虽然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性病预防的手段，但他们不太会主动搜索与性健康有关的信息，也几乎不会与其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为了帮助信息传播实践者在实际工作中区分三类细分群体，本研究还比较了细分群体之间的媒体使用特征，主动群体在各类信息的接触频率上均显著高于被动群体。在多个媒体之间，农民工对大众媒体中的性健康信息的接触频率最高。健康教育者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被动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尤其是在提升该类群体的涉入度与降低其行动障碍感方面做出努力，另一方面提示健康教育者需重视发挥主动群体的传播力度，并积极利用大众媒体，促进主动群体构成信息二次传播的传播者，进而影响普通群体和被动群体。

综上，笔者认为性健康信息的教育者和传播者需要注重性健康信息传播的群体细分，并着重发挥主动群体的作用。因为这类群体最有可能接收性健康信息，同时有较强的性健康信息需求，也有主动接收信息的意向，需要性健康教育者制定不同的传播信息策略，以满足和带动不同的细分群体的信息需求，提升性健康教育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 [1] 李少芳, 钟朝晖, 雷迅, 等. 重庆市农民工人群高危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1(1): 94-99.
- [2] 薛玉书. 农民工性传播疾病感染情况分析[J]. 中国性科学, 2007(1): 19.
- [3] 陈诚平, 崔义中. 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性状况及其社会影响分析[J]. 中州学刊, 2007(1): 127.
- [4] 李玉艳, 李娜, 周颖, 等. 深圳市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 复旦学报: 医学版, 2010(3): 304-309.
- [5] Grunig, J. E.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ism Monographs, 1966, 3: 1-51.
- [6] Atwood, L. E., & Major, A. M. Applying situ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oblem: two studies[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91, 68(1/2): 200-210.
- [7] Lee, S., & Rodriguez, L. Four publics of anti-bioterrorism information campaigns: A test of the situational theory[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8, 34: 60-62.
- [8] Grunig, J. E. A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Conceptual history, recent challenges and new research. In D. Moss, T. MacManus, & D. Vercic (Eds.),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pson Business Press, 1997: 3-46.
- [9] Clarke, P., & Kline, F. G. Media effects reconsidered: Some new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4, 1: 224-240.
- [10] Grunig, J. E. & Hunt, T. *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M]. New York: Holt, Rh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 [11] Kim, J-N., & Grunig, J. E.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a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61: 120-149.
- [12] Chaffee, S. H., & Roser, C. Involvement and the consistency of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6, 13(3): 373-399.
- [13] Grunig, J. E. Constructing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 Dervin, S. Chaffee, & L. Foreman-Wernet (Eds.), *Communication, another kind of horse race: Essays honoring Richard F. Carter*[M].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2003: 85-115.
- [14] Kim, J-N, Shen, H & Morgan, S. E. Information behaviors and problem chain recognition effect: Applying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in organ donation issues[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1, 26(2): 171-184.
- [15] Grunig, J. E. Sierra Club study shows who become activists[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1989, 15(3): 3-24.

责任编辑: 陈向科